

汉代西域屯戍空间构建与民族融合

党琳

摘要: 自汉代经营西域以来,屯垦戍边作为“千古之策”,不断推动着中原王朝西域治理措施的完善和民族融合的进程。两汉时期,中原政权在天山南麓的渠犁、轮台等地屯戍,逐渐形成了西抵龟兹、疏勒,东至伊吾,南括楼兰、于阗、莎车,北至乌孙的屯戍格局,奠定了中原治理西域的空间基础。同时,汉代设西域都护府为西域军政中心管理屯戍,进一步完善了屯戍治理制度,并通过修筑驿道、构建烽燧体系等措施,为西域屯戍空间管理提供了关键的军防保障。此外,汉代屯垦戍边推动大量中原民众移居西域,逐渐形成了以中原治理为中心的生产生活区域,引领西域多民族对中原王朝形成空间认同、文化认同,加快民族融合进程,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注入不竭动力。

关键词: 汉代西域;屯戍空间;民族融合

中图分类号: K2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5)05-0141-09

汉代,中原王朝首次在西域成功构建了稳定的屯戍空间,即以西域绿洲地理空间和资源禀赋为依托,移驻大量中原军民,寓兵于农,在保障边疆安全稳定的基础上与西域当地族群共同生产生活,形成军防体系与农耕生产一体化的区域空间,奠定了中央政权主导下的边疆治理范式,加快了中原与西域多元族群交融的进程。目前学界对于汉代西域屯垦戍边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主要集中于屯戍制度、屯垦经济等方面。^①对于汉代屯垦戍边促进西域多民族逐渐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作用,尚未有系统研究成果。本文通过分析汉代西域屯戍空间构建与制度保障的发展完善,探讨其推动民族交融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内在逻辑。

一、千古之策:汉代屯戍理念与西域屯戍空间构建

汉代以抵御匈奴、解决军队后勤保障的移民实边理念为线索,在西域构建了“知胡人之能”的自给

自足、长效稳定的屯戍空间,将屯戍体系深入西域绿洲腹地,保障西域安全稳定,拓展了中原王朝在西域的战略空间。

(一) 汉代屯戍理念的形成及其理论建构

西域屯戍肇始于汉代抵御匈奴的战略探索。西汉早期,汉朝军队对于匈奴“至如焱风,去如收电”^{[1]2401}，“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2]3483}的行军策略并未有妥善的解决措施,草原游牧族群的超强机动性一直是以农耕为本的中原王朝的棘手难题。于是,长期驻扎塞外开展稳定生产生活,推动军队自给自足并能主动观察学习“胡人之能”的屯垦戍边之策应运而生。前元十一年(前169),晁错上书建议:“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以便为之高城深堑,具藁石,布渠答,复为一城其内,城间百五十步。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毋下千家,为中周虎落。先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复作令居之。”“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给而止。”“徙民实边,使远方无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系虏

收稿日期:2025-01-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历史上的边疆治理与民族融合研究”(24&ZD264)。

作者简介:党琳,女,上海大学丝绸之路文明互鉴研究中心研究员,历史学博士(上海 200444)。

之患,利施后世,名称圣明,其与秦之行怨民,相去远矣。”^{[1]2286}晁错提出以“常居者”为主体在“要害之处,通川之道”形成稳定的农耕系统的治理理念,是中原王朝对边疆屯戍空间构建的初步构想。

汉武帝时期,晁错的屯垦戍边之策进一步落实。元朔二年(前127),汉朝集十万余口民众移置朔方;元狩二年(前121),汉朝在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1]3873};元狩五年,汉朝“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1]179},北地的移民实边已颇见成效;至元鼎六年(前111),“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1]1173}。晁错实边措施在河西地区有效实施,为汉朝在西北屯田奠定了实践基础。

征和四年(前89),桑弘羊提出“扩大轮台屯田书”,主张从内地招募大量民众进驻西域,扩大轮台以东屯田,“置校尉三人分护,各举图地形,通利沟渠,务使以时益种五谷”,“田一岁,有积谷,募民壮健有累重敢徙者诣田所,就畜积为本业”^{[1]3912}。桑弘羊的屯戍思想更为深入,为此后汉朝在轮台设置西域都护府为军政中心开启先声。神爵元年(前61),赵充国三上屯田之策,“步兵九校,吏士万人,留屯以为武备,因田致谷,威德并行,一也”,“居民得并田作,不失农业,三也”,“大费既省,徭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1]2987-2988},全面分析了“留田便宜十二事”,促使汉代屯田向湟中地区推广。晁错、桑弘羊和赵充国等人屯戍理念的不断丰富,使汉代屯戍思想渐趋成熟。

屯垦戍边主要解决了中原王朝长途行军的后勤供给难题。粮草运输历来是行军作战的重要保障,但中原王朝在长距离行军作战时,始终面临着“天下飞刍挽粟,起于黄、睡、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1]2800}的巨大损耗问题和“汉极大,然不能饥渴,失一狼,走千羊”“士卒不患战,患饥”^{[2]3854}的困境。尤其在以沙漠气候为主的塔里木盆地以及高寒的帕米尔高原等地行军作战,充足的后勤保障起到决定性作用。屯垦戍边以稳定的农耕生产为依托,不仅可以有效解决后勤供应难题,而且也极大地节省了运输成本,正如《册府元龟》所载:“夫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屯田之利,繇是兴矣。”“是皆因戍营田,因田积谷,兼兵民之力,省飞挽之劳,比夫负海转输,率三十钟而致一石者,其利岂不博哉!”^②

同时,根据汉代的屯戍理念,中原王朝可通过屯垦戍边在西部地区建构起“农耕—戍防”的复合体

系,使得中原王朝在草原游牧族群侵扰时能充分发挥自身的战略优势。史载:“良骑野合,交锋接矢,决胜当时,戎狄之所长,而中国之所短也。强弩乘城,坚营固守,以待其衰,中国之所长,而戎狄之所短也。”^{[3]2961}因此,中原以屯垦戍边构建了稳定的区域,使得驻边将士且耕且战,有效保障了西域安全。这种“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1]2988}的措施,也被后世誉为治理边疆的“千古之策”。

(二) 汉代西域屯戍布局与空间发展

汉朝在西域的屯戍经营以塔里木盆地为中心,呈现出自东向西推进、由南向北探索的发展布局。汉代西域屯戍以塔里木东缘为起点,自楼兰、车师、柳中向西推进,经龟兹、姑墨至疏勒、莎车等地,占据塔里木腹心绿洲农耕资源优越的区域,控扼西域交通要道。同时,汉朝以塔里木绿洲为基础,对天山北麓草原游牧区域初步探索,体现了中原王朝对西域治理空间的战略性延展。

1. 塔里木绿洲屯戍布局的推进

汉朝在塔里木盆地绿洲开展屯戍有着广泛的战略基础。西汉早期,匈奴日逐王设僮仆都尉,“常居焉耆、危须、尉犁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1]3872},使得塔里木盆地成为其取之不尽的“府库”,《盐铁论·西域》载:“胡西役大宛、康居之属,南与群羌通。先帝推让斥夺广饶之地,建张掖以西,隔绝羌、胡,瓜分其援。是以西域之国,皆内拒匈奴,断其右臂,曳剑而走,故募人田畜以广用,长城以南,滨塞之郡,马牛放纵,蓄积布野,未睹其计之所过也。”^[4]

于是,汉朝以塔里木东缘的楼兰为起点正式构建西域屯戍空间。元封四年(前107),赵破奴、王恢虏楼兰王,破姑师,威震乌孙、大宛,“于是汉列亭障至玉门矣”^{[1]3876}。但楼兰同时遣二质子分别质于匈奴和汉朝,汉朝未完全掌控“楼兰道”。大宛之战后,“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犂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1]3873},汉朝正式控制了经罗布泊进入西域的道路,并开展屯垦戍边。元凤四年(前77),汉朝册立尉屠耆为楼兰王,将楼兰改名鄯善。尉屠耆主动请求汉朝在其境内屯田,“身在汉久,今归,单弱,而前王有子在,恐为所杀。国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愿汉遣一将屯田积谷,令臣得依其威重”^{[1]3878},由此汉朝正式开始在鄯善屯田并治理塔里木东缘。

从考古发现来看,塔里木东缘地区至今留存有大量汉代屯戍遗存,如“楼兰道”上的交通枢纽居庐仓(即土垠遗址)。该地出土的汉简内容多与屯田、

交通相关,如“乙巳晨时都吏葛卿从西方来出谒已归舍旦葛卿去出送已尘仓校口食时归舍日下铺时军候到出谒已归舍”“使者王口且东去督使者从西方来立发东去口口仓吏口黄昏时归仓”等记载^[5],可见作为屯戍要地的土垠遗址曾提供沿途补给。

汉朝以楼兰为战略支点,依托孔雀河水系构建的戍防廊道,实现屯戍空间向塔里木腹心轮台、渠犁等地渐进式延伸。该地区地处天山南麓,水系稳定,土壤肥沃,资源禀赋优越。渠犁“东北与尉犁、东南与且末、南与精绝接。西有河,至龟兹五百八十里”;又乌垒“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犁”^{[1]3911}。《水经注》载:西有大河“又东南流,经渠犁国,治渠犁城,西北去乌垒三百三十里。汉武帝通西域,屯渠犁,即此处也”^{[6]38}。“西有河”即塔里木河,渠犁北连乌垒,东连营盘、孔雀河流域一带,南接且末、车尔臣河流域,是屯垦戍边的理想之地。桑弘羊建议扩大轮台屯田就指的是该地屯田:“故轮台东捷枝、渠犁皆故国,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与中国同时孰。”^{[1]3912}渠犁一带的广阔耕地和适宜气候为屯田提供了优越的生产条件,可保障汉朝军队长途奔袭的后勤问题。

从渠犁继续北行可直抵轮台,《西域水道记》载:“玉古尔者,汉轮台地。《西域传》云:‘轮台、渠犁,地相近也。’庄南四十里有故小城,又南二十里有故大城,又南百余里,尤多旧时城郭。田畴阡陌,畎陇依然,直达河岸,疑田官所治矣。”^[7]汉宣帝时期,西域都护府就设置在“西域之中”的轮台乌垒城。渠犁、轮台一带作为汉代经营西域的腹心要地,将屯戍空间从塔里木东缘向塔里木北道推进,向东即可进入焉耆及车师,与塔里木东缘策应,向西是塔里木北道最大的绿洲龟兹。因此,汉代在轮台、渠犁一带的屯田,控扼交通枢纽,保障沿途供给,奠定了汉代西域屯戍空间拓展的战略基础。

汉成帝建始年间,西域屯田向西拓展至姑墨一带,史载“汉徙己校屯姑墨,欲候便讨焉”^{[1]3908},即汉朝将己校尉迁中天山南麓一带的姑墨展开屯戍。

最后,汉朝在西域的屯戍布局也延伸至塔里木盆地西南的莎车之地。早在西域都护府设置后,汉朝就“田于北胥鞬,披莎车之地”^{[1]3874},敦煌悬泉汉简中也有关于“比胥鞬校尉”^{[8]65}的记载。东汉班超经营西域时,进一步推动了以疏勒、莎车为主的塔里木西缘屯戍区域的开发。疏勒绿洲具有农耕生产的天然优势,班超上书认为:“莎车、疏勒田地肥广,草木饶衍,不比敦煌、鄯善间也,兵可不费中国而

粮食自足。”^{[3]1576}以莎车、疏勒为中心的屯戍完善了汉代在塔里木西缘的屯戍空间建构。

2. 东天山屯戍拓展战略的纵深

汉朝对东天山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视。东天山处车师,地跨天山南北,东通蒙古高原和河西走廊,地缘优势显著。自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遣兵击车师而匈奴救之^{[1]3922},直至汉宣帝神爵二年匈奴日逐王降汉,汉匈经历了“五争车师”的长期拉锯战。

车师优越的农耕资源颇为汉匈所重视,因此双方为维护各自屯田而产生冲突。昭帝时,车师被匈奴控制,“匈奴复使四千骑田车师”^{[1]3922},隔绝汉朝与乌孙的交通;地节二年(前68),郑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别田车师”,汉朝的屯田区域首次正式扩展至车师。匈奴认为“车师地肥美,近匈奴,使汉得之,多田积谷,必害人国,不可不争”^{[1]3923},于是车师又易手匈奴。然复置屯戍体系始终是汉朝经略西域的核心诉求,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汉朝在车师设置了戊己校尉,“有丞、司马各一人,候五人,秩比六百石”^{[1]738},其主要职责正是掌管屯田,即“戊己中央,镇覆四方,又开渠播种,以为压胜,故称戊己焉”^{[3]2910}。戊己校尉直接受汉朝中央政府管辖,其屯兵也成为西域紧急情况军力储备保障。

车师屯田也为汉朝探索天山北麓提供了后勤保障。东汉重开西域时率先从伊吾打开缺口,汉明帝两次出兵东天山北麓今巴里坤一带。永平十六年(73),汉朝在伊吾庐,即今哈密、巴里坤一带,设置宜禾都尉进行屯田。永平十七年,汉朝破车师后“始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乃以恭为戊己校尉,屯后王部金蒲城,谒者关宠为戊己校尉,屯前王柳中城,屯各置数百人”^{[3]720},金蒲城位于巴里坤以西,汉朝在天山北麓的战略主线逐渐向西推进。

此外,延光三年(124),班勇带领屯田士兵在柳中开展大规模屯田,成效显著,将东天山与塔里木东缘楼兰绿洲连成一线,“西当焉耆、龟兹径路,南强鄯善、于阗心胆,北捍匈奴,东近敦煌”^{[3]1588},柳中成为汉朝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地。

整体而言,汉朝以塔里木盆地东缘的楼兰屯田为桥头堡,以北道腹心的轮台、渠犁屯田为保障,将其在西域的治理空间不断向周缘扩展,进而将塔里木西缘的疏勒、莎车以及东天山纳入治理范围,将中原治理西域的战略空间确定在葱岭以东。同时,汉朝对天山北麓的治理尝试证明了在传统草原游牧区域进行屯垦戍边的可行性。屯垦戍边成为中原王朝底定西域治理空间、拓展战略纵深的关键一环。

二、因地制宜：汉代西域屯戍空间管理

汉朝以西域都护府为最高军政长官管理西域屯田事务,推动了西域当地社会生产和西域屯戍管理制度的完备与发展,奠定了历代中原王朝对西域屯戍实施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管理措施的基调。同时,汉朝通过修建屯城和烽燧带形成了组织严密的环塔里木屯戍体系,成为汉朝稳定西域和保障丝绸之路安全畅通的重要军防建设。

(一) 西域都护府创置推动屯戍制度完善

西域都护府是中原王朝设置在西域的第一个军政中心,奠定了西域军防体系的核心机制。神爵二年,匈奴日逐王降汉,汉朝于乌垒城设置西域都护府。《汉书·西域传》记载,“都护治乌垒城”,“与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饶,于西域为中,故都护治焉”。郑吉为第一任西域都护,是为“护鄯善以西使者”,因“并护北道”,故号“都护”,主要“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1]3874}。西域都护府为北军的派出机构,具体由中垒校尉负责^[9],代表了中央政府对西域的治理,史载“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1]3006}。

首先,西域都护为管理西域屯田的最高军政长官,下辖校尉、曲侯以及屯长等,组成完整管理体系。初元元年,汉朝设戊己校尉,居车师之地,与西域都护共治西域屯田事宜。悬泉汉简 II 90DXT0115②:16 中记载:“五月壬辰,敦煌太守彊、长史章、丞敞下使都护西域骑都尉、将田车师戊己校尉、部都尉、小府、官县、承书从事下,当用者。”^{[8]22}根据简牍的内容,由敦煌太守下发的一道大赦诏书,需同时发往西域都护府、戊己校尉两处所辖的各个部门。

汉朝通常选择熟知西域形势又有着屯戍管理经验的官吏出任都护及各级管理职位,协调各屯田的运作,确保屯戍事务顺利开展。汉简中保存了大量关于西域各地校尉、军候等屯田官吏的记载,如“将田渠犁军候令史□意□它宗更终罢诣北军甘露三年五月癸未朔庚子使都护西域骑都尉安远侯吉谓诏为驾一封轺传二人共车载有请……续食给法所当得如律令 II 90DXT0115④:230”^{[8]155};“建始五年……将田车师左部中曲候令史礼调罢将候行丞……以次为驾诣北军为驾一封轺传有当□……□□史□□□ II 90DXT0214②:137A”^{[8]285}。“都护西域骑都尉安远侯吉”即西域都护郑吉;“渠犁军候”

“车师左部中曲候”等为渠犁、车师地区屯田的管理军吏。其他地区又如,管理伊循屯田的伊循都尉、伊循城都尉等,汉简记载“敦煌大守遣守属冯充国上伊循城都尉登印绶御史”^{[10]83};管理伊吾屯田的宜禾都尉,永平十六年,“明帝乃命将帅,北征匈奴,取伊吾卢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3]2909},汉简亦记载:“讯宜禾都尉即日发渊泉之广汉西过宜。”^{[10]110}各级官吏皆由西域都护所辖,职掌清晰,确保屯戍机制的正常运行,体现出汉朝对西域屯戍的严密管理。

其次,汉朝对于西域屯田的种子、耕牛等生产资料和戍卒的衣食供给等,都有着严格制度规定。汉代西域屯田由国家为屯戍士卒提供“田舍”以供居住,分配耕牛、种子、农具等,保障屯田生产。据居延汉简记载,屯田士卒衣物所需也由国家供给,“田卒淮阳郡长平里公士李行年廿九”,“裘一领大袜一两”,“袴一两私袜二两”,“自取(303·34)”^[11]。罗布泊汉简中“□□□□□家属六人官驼二匹食率匹二升”“十二月十日,□□粟二石”^{[12]266},“为东卿造水三斗,醇酒一斗□”^{[12]268}等,体现了国家为田卒及家属随从供给口粮、酒等日常所需的事宜。

最后,汉代也设置了烽燧屯田以供军粮,“东汉时田价大率每亩三千,纪产碑所云一町,至少在一亩以上,举本简积廿一步为一町,迥然不同。足证町之面积大小,随地区分,并无定制”^[13],说明汉代烽燧周围的土地及屯田经营没有“定制”,按照军事紧急程度、生产环境、农耕条件等,分别设置不同规模的屯田布局,可见汉代烽燧屯田因地制宜的管理模式。

(二) 屯戍空间军防建设保障西域安全

1. 烽燧屯戍布局与西域交通安全

汉代交通发达,西域交通路网在屯戍政策有效实施的基础上,形成了环塔里木屯戍交通体系,这些“运用政府的力量进行强有力组织、建设、保护、管理的交通干线”^{[14]46},控扼交通要塞,稳定边疆局势,成为西域军防体系构建的重要依托。

汉代早期以楼兰为桥头堡开启西域经略,首先以保障“楼兰道”安全畅通为基础。楼兰道地接敦煌与楼兰绿洲,西北连接西域都护府,是汉朝最先开辟的通往西域的官道之一。史载楼兰“去阳关千六百里”^{[1]3875},从敦煌向西越三陇沙,过白龙堆,沿途经居庐仓抵达楼兰绿洲,从楼兰绿洲溯孔雀河便可通往塔里木腹地。早在李广利伐大宛后,汉朝便注重维护楼兰道的畅通,“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1]3873},将烽燧带延伸至罗布泊一带。

随着汉朝在西域的经营逐渐深入,“障塞亭燧

出长城外数千里”^{[3]2876},塔里木东缘的孔雀河烽燧群也渐趋完善。目前,新疆尉犁县孔雀河沿线仍留存有11座烽燧遗址,如沙鲁瓦克烽火台、萨其该烽火台遗址等^[15]。汉代由此构建起一条自罗布泊起西北至渠犁,西至库车,东北直至焉耆、和硕的烽燧体系,与屯田区的设置相对应,形成屯田戍守、交通保障和烽燧体系互为一体的空间区域。

此后,汉朝以西域都护府为中心,设置烽燧屯戍体系保障丝绸之路“南道”和“北道”官道交通安全畅通,其“国防之严密,规模之雄伟,有为吾人惊叹不置者”^{[12]78}。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1]3872}汉朝以“并护南北两道”的西域都护府为中心,其烽燧布局最初在焉耆、渠犁、轮台等地呈点状零星布局,后来逐步发展至天山南麓一线^[16],由点到线,由线及面,将塔里木盆地纳入军防空间,也使得“过去很可能是自发的、民间的、无组织的、接力棒似的交通联系转化成了在西汉王朝自觉努力之下,运用政府的力量进行强有力组织、建设、保护、管理的交通干线”^{[14]46}。如位于今库车市却勒塔格山南麓的克孜尔尕哈烽燧,修建于汉宣帝时期,是目前古丝绸之路上时代最早、保存最为完好的烽燧遗存^[17]。克孜尔尕哈烽燧北据天山,控扼盐水沟交通,东西连接西域都护府与龟兹、疏勒一带交通,不仅是汉代丝绸之路“北道”交通的关键节点,也是龟兹“北与乌孙、西与姑墨接”^{[1]3911}交通路线上的重要军防工事,战略地位显著。

2. 屯戍空间军防建设与西域边疆稳定

以屯戍空间构建的交通体系和军防屏障为基础,西域成为汉朝稳定西北边疆、保障多民族区域安全统一的前沿阵地。汉朝对西域的军防地位有着深刻的认知,一旦疏于治理,匈奴“势必南攻鄯善,弃而不救,则诸国从矣。若然,则虏财贿益增,胆势益殖,威临南羌,与之交连。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则百倍之役兴,不訾之费发矣”^{[3]2912}。因此,西域都护承担着“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1]3874}的重要职责,对于保障西北边疆安全发挥重要的军防功能。

汉代西域都护府以屯垦戍边构建的军防体系,对稳定天山南北局势发挥了重要作用。汉宣帝甘露

元年(前53),乌孙国内大乱,原本退保北山的乌就屠杀乌孙狂王并反汉。此时乌孙形势紧急,西域都护郑吉派冯嫫前往劝说乌就屠,同时“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鞬侯井以西,欲通渠转谷,积居庐仓以讨之”^{[1]3907},随时准备迎战乌就屠。在西域都护府与朝廷的相互策应之下,乌就屠遂降汉。汉朝进而派常惠统领三校士卒屯田赤谷,督察、稳定乌孙的内部形势,自此乌孙及其周边趋于稳定。

西域屯戍驻军也是汉朝抵御来自葱岭以西地区军事威胁的核心力量。汉元帝建昭三年(前36),面对郅支单于的威胁,西域副校尉陈汤矫诏发兵,主要调遣了驻扎在车师的戍己校尉屯田吏士以及塔里木绿洲诸国军队,共集结胡汉四万兵力,到达康居斩郅支单于,解除西域大患,“悬旌万里之外,扬威昆山之西,扫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万夷慑伏,莫不惧震”^{[1]3015}。这一战役有效解除了郅支单于对塔里木绿洲诸国的威胁,稳固了汉朝的治理。

此外,正是得益于汉朝对西域屯戍空间内交通军防的持续建设,西域屯田规模和经济效益也得到极大提升。在汉代西域屯垦的繁盛期,西汉有楼兰、伊循等共计12个屯区,最高峰期同时派往西域屯田的总人数在3000人左右,屯垦土地在6万亩左右;东汉西域屯田“三废三置”期间,屯田面积最多时也达6万亩^[18],奠定了汉代治理西域的经济基础。

三、与中国同:汉代西域屯戍空间内的民族融合

汉朝通过屯垦戍边推动大量中原移民进入西域,与西域多民族互动交融,构建了共同的生产生活区域。在汉朝的有效治理下,中原传统文化也对西域多民族产生了深刻影响,形成了多元丰富的文化交流和中原王朝的向心力与认同感,成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动力。

(一) 西域绿洲诸国对汉朝的空间认同

空间认同是指在汉朝治理西域的进程中,以屯垦戍边为主要措施,将西域绿洲诸国逐渐纳入中原王朝的治理体系,从统属关系和情感心态等方面皆呈现出对汉朝的充分认可。其中,以楼兰、龟兹、于阗、疏勒、莎车等绿洲大国的归附最具代表性。

其一,楼兰对汉朝的空间认同是中原王朝有效治理西域的肇端。在汉朝经营“楼兰道”初期,楼兰同时臣属于汉朝与匈奴,认为“小国在大国之间,不

两属无以自安”^{[1]3877}。但大宛之战后,汉朝声威远震,西域诸国纷纷降附,且汉朝将亭障建设从敦煌已经延伸至罗布泊地区,在楼兰以西的轮台、渠犂等地始设屯区,有屯卒数百人,并设置使者校尉领护,初步建立了汉朝的屯戍区域和战略基地。元凤四年,汉朝册立亲汉的尉屠耆为王,将楼兰改名鄯善,尉屠耆则主动请求汉朝在其境内屯田,“身在汉久,今归,单弱,而前王有子在,恐为所杀。国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愿汉遣一将屯田积谷,令臣得依其威重”^{[1]3878}。可见,尉屠耆充分认可汉朝寓兵于农且战且屯的治理模式,认为其不仅能对耕地资源加以开发利用,更是他政权得以稳定的根本保障。

由此,楼兰呈现出从“两属”到“依其威重”的心态转变,实现了对汉朝的空间认同,成为汉朝经营西域进程中最早归附的绿洲国家之一。东汉时期,班勇治理西域时,就指出应遣西域长史率兵屯田楼兰,作为收复西域的战略基地。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对西域的治理范围大幅度内缩,而楼兰地区仍然是中原下辖的重要地区之一。

其二,塔里木北道最大的绿洲龟兹对汉朝的归附极大地推动了汉朝的治边进程。早期,龟兹对于汉朝在轮台屯田较为警惕。汉宣帝本始三年(前71),汉朝在塔里木北道占有优势,且在楼兰、轮台、渠犂一带屯田效益显著,局势稳定。地节元年,常惠出使西域,龟兹顺利降附汉朝。此后,“边境少事”,龟兹一直与汉朝保持良好的关系,至汉成帝时,西域都护段会宗前往龟兹,诸国皆遣子弟迎之,前期段会宗所立的乌孙小昆弥安日力排众议,极力前往龟兹拜谒段会宗,一时间“城郭甚亲附”^{[1]3030},可见龟兹的降附及空间认同对西域诸国产生的巨大影响。

王莽时,西域叛乱,西域都护李崇“收余士,还保龟兹”^{[1]3927},龟兹成为汉朝最后的据点。东汉班超收复西域后,正是以龟兹它乾城为西域都护府所在地,占据“西域之中”,形成对西域的全面治理之势。悬泉汉简中的“姑墨王遣使者休靡奉献橐佗马”^{[10]9},记载了龟兹以西的姑墨国作为附属国遣使向汉朝朝贡的事迹。

其三,莎车、疏勒的降附是西域西部及南部绿洲诸国对汉朝空间认同的重要体现。东汉初,塔里木盆地局势动荡,但莎车仍然延续着对汉朝的空间认同,坚持对抗匈奴。史载,莎车王康“檄书河西,问中国动静,自陈思慕汉家”^{[3]2923}。汉章帝时期,西域局势危急,班超欲奉诏返回,绿洲诸国极力挽留班超,疏勒都尉黎弇痛哭云“汉使弃我”,并自刎以挽

留班超,于阗绿洲居民更是“互抱超马脚”号泣,曰“依汉使如父母”^{[3]1575}。西域多民族对汉朝的强烈空间认同感,使得班超能够以疏勒、莎车等塔里木南道诸国为基础,最终收复西域。

(二) 西域多民族对中原的文化认同

汉朝时大量中原屯戍移民进驻西域,开启了“武功既抗,亦迪斯文”^{[1]4237}的治理历程,推动了以礼仪制度、汉文字等为代表的中原文化的传播,促进西域多民族的文化认同,实现“不动中国,不烦戎士,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3]1582}的治理目标。

第一,对中原礼仪制度的认同。汉代开通西域后,西域各地学习中原文化的热情高涨,史载“西域诸国,自日之所入,莫不化向,大小欣欣,贡奉不绝”^{[3]1576},从上层到普通民众逐渐对中原文化产生认同和向往。如龟兹王绛宾每次来长安朝贺,对于汉地的服饰、制度无不倾慕,返回龟兹后,规定修建宫室、布置微道、皇室出入、撞钟鼓等规则,皆以汉朝礼仪为标准,以至于“外国胡人皆曰:‘驴非驴,马非马,若龟兹王,所谓骡也’”^{[1]3917}。绛宾死后,其子丞德自称“汉外孙”,“丞德”显然为汉名,取继续承受汉王朝恩德之意,其对中原文化认同可见一斑。

东汉初期,西域动荡不安,但“长于京师,慕乐中国”的莎车王仍坚持“亦复参其典法”^{[3]2923},即仍然参照汉朝的典章法规治理莎车国,使得莎车国成为当时的“绿洲”强国。东汉建武二十八年,“北匈奴复遣使诣阙,贡马及裘,更乞和亲,并请音乐,又求率西域诸国胡客与俱献见”^{[3]2346},此处的“请音乐”正是将中原的乐舞艺术带至草原游牧区域。

第二,对汉文字的书写和使用。汉朝在西域曾大力推广汉文字,并得到绿洲诸国的认同。尼雅遗址曾发现一块刻有“溪谷坂险丘陵故旧长缓肆延涣”的《仓颉篇》残文本牒^[19],《仓颉篇》是秦汉时期中原地区的重要启蒙读物,可见当时已传入西域诸国。此外,碑铭、石刻等也是西域使用汉字的重要体现,今新疆拜城县黑英山东汉“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治关亭涌”石刻^[20],刻于永寿四年(158),足以说明当地深受汉文化浸润。

出土于今天新疆和田、若羌等地的“汉佉二体钱”,为公元73年至127年由于阗国发行的自造币,一面为汉文铭文,如“于阗大王”四字,另一面印佉卢文。^③又如“龟兹五铢钱”,又称“汉龟二体钱”,是东汉至唐代龟兹王国发行的钱币,一面为汉字,一面为婆罗谜文。^④这些钱币是丝绸之路主要流通货币之一,其铸造和发行体现了西域对汉文字的认同。

再如尼雅精绝王墓中出土的蜻蜓眼料珠,其王室中人称之为“琅玕”,具有汉文化特色,反映了精绝王室中可能有深谙汉文化的知识分子,可见两汉王朝统治西域时汉文化在当地被广泛推行^{[14]237}。

值得注意的是,汉字的推广也带动了儒家文化在西域的传播,对西域多民族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移民运动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迁移”^[21],汉代中原儒家经典也随屯戍移民进入西域。罗布泊汉简中“亦欲毋加诸人子曰赐非”的残简,为《论语·公冶长章》中“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内容的书写,出土于“罗布淖尔古烽燧亭南兵房中”^{[12]271},是儒学经典经屯戍移民传播至西域的体现,也是汉文字在西域流播的实证。草原游牧族群深受儒家孝文化的影响,匈奴单于也在自己称号上加上“若鞮”：“匈奴谓孝曰若鞮。自呼韩邪单于降后,与汉亲密,见汉帝谥为孝,慕之。至其子复珠累单于以下皆称若鞮。”^{[3]2939}“若鞮”即“孝”之意,可见南匈奴对汉代“以孝治天下”理念的认可。

整体而言,以中原文化传播为线索,屯戍移民推动了屯戍空间内西域对中原的文化认同,“文化浸濡的作用可能超越强力的威慑和武装的征服”,“应当对文化看似轻柔,然而久韧的影响力予以充分的重视”^[22]。由此,汉朝在边疆地区不断推行的促进西域多民族文化认同的治理措施,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思想文化基础和社会心理基础。

(三) 屯戍空间治理加快民族融合的进程

汉朝对西域屯戍空间的治理措施,充分保障了西域屯戍空间的有序发展,促进了西域绿洲的农耕生产和农牧经济互补,推动东西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互动,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进程。

第一,西域屯戍空间构建带动了多元族群共同参与屯垦开发,奠定了多民族共同生产生活的社会认知基础。汉代来自中原的弛刑之人是西域屯田的主要群体之一,如班超所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3]1586}东汉自永平以来,“家属徙边”,“又远屯伊吾、楼兰、车师、戊己”^{[3]1597},汉章帝时期,“诏天下系囚减死一等,勿笞,诣边戍;妻子自随,占著所在;父母同产欲相从者,恣听之”^{[3]147}。弛刑士与家属已经成为西域屯戍移民的重要力量,悬泉汉简就有“凡徒施刑五十人戍边”^{[23]158}的记载。

以中原屯戍移民为主,汉朝也推动西域绿洲族群融入屯戍体系,以保障西域屯戍正常运行。太初

元年(前104),李广利伐大宛返回时,见扞弥国太子赖丹质于龟兹,责问龟兹竟受扞弥国人质,遂将赖丹带至京师。元凤四年,汉昭帝用桑弘羊之议,以赖丹为校尉在轮台屯田。赖丹熟悉西域形势和地理环境,与他同时前往西域的又有楼兰质子尉屠耆,其主动请求汉朝屯田伊循,拉开了汉朝在西域正式驻兵屯田的序幕,足见汉朝在屯田之初就展现出兼纳西域多元民族参与屯田的考量。

根据楼兰尼雅出土简纸文书记载,“兵支胡薄成、兵支胡重寅得”“兵支胡管支”等西域民族屯兵,正是西域长史在楼兰就近招募的^[24]。而且,汉代西域进行了大规模水利开发,据《水经注》记载,索勋“将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楼兰屯田。起白屋,召鄯善、焉耆、龟兹三国兵各千,横断注滨河”^{[6]35},在此过程中,动用了鄯善、焉耆、龟兹三个国家各上千名士兵参与修筑大坝和横断滨河。“鄯善国,本名楼兰”,“户千五百七十,口万四千一百,胜兵二千九百十二人”^{[1]3875},据此推算,楼兰国投入了三分之一的兵力参与农业生产和屯戍建设。由于楼兰国在汉代以前就已存在,其人口构成主要是非汉人的本地居民,而这里的屯田活动从汉代持续到唐代,在这一延续数百年的屯戍建设中,当地各民族的长期参与,包括汉族军队、当地汉人以及其他民族居民^[25],使得多元族群之间交流交往融合成为可能。

第二,中原屯戍移民将先进的生产技术传播至西域,有效提升了绿洲农耕的生产能力,强化了民族凝聚力。塔里木盆地干旱少雨,农耕生产依赖于当地河流湖泊的水资源供给,如《洛阳伽蓝记》所载疏勒一带:“自葱岭已西,水皆西流,世人云是天地之中。人民决水以种,闻中国田待雨而种,笑曰:‘天何由可共期也?’城东有孟津河,东北流向沙勒。”^⑤此处的“孟津河”即今叶尔羌河,“沙勒”即疏勒;当地人民对于中原“待雨而种”“与天共期”的做法感到不可思议,这也体现出对于沙漠绿洲而言,稳定的河流灌溉对农业生产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再如罗布泊地区,根据《水经注》的记载,“龙城,故姜赖之虚,胡之大国也。蒲昌海溢,荡覆其国,城基尚存而至大,晨发西门,暮达东门。浚其崖岸,馀溜风吹,稍成龙形,西面向海,因名龙城。地广千里,皆为盐而刚坚也”^{[6]38},历史上罗布泊曾水漫白龙堆的情况。罗布泊由于含盐量较高,形成了千里无法耕种的盐碱地,这也使得楼兰国农业并不发达,“地沙鹵,少田”,常“寄田仰谷旁国”^{[1]3876}。

由此,中原王朝在西域的屯田生产首先加强对

当地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楼兰出土文书所载“塞水南下推之”即为汉代“截水改流”的人工操作^[26]；敦煌索励“横断注滨河”，于是“大田三年，积粟百万，威服外国”^{[6]35}；而从一个较小的居民点发展成为一个塔里木东缘的核心城镇^[27]，也正是基于中原王朝对当地水资源的密切关注和充分利用，楼兰城才能依靠屯田、军事等职能迅速发展。穿井凿渠技术在西域也得到推广，《汉书·西域传》载“大井六，通渠也。下泉流涌出，在白龙堆土山下”，其“通渠”很可能就是用于引出地下水^[28]。《史记·大宛列传》载：“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2]3177}王国维指出：“是穿井为秦人所教。西域本无此法，及汉通西域，以塞外乏水，且沙土善崩，故以井渠法施之塞下。”^[29]由此可见，穿井凿渠之法颇为适合西域尤其是恰克马克河两岸沙土松软、易崩的土壤构造。

屯田生产工具也不断向西域传播。考古工作者在昭苏县的一座乌孙古墓中发掘出一件铁铧，形制和大小与敦煌所出铜铧几乎完全一样。正因汉朝在赤谷驻军屯田，西域才与中原地区在农业技术上出现了共同性^[30]。木垒县新户古城、英格堡古城都曾出土一种汉代的舌形铁犁铧，随铁犁铧一起出土的还有石磨盘、石杵、谷仓以及大量霉烂的粮食与马粪残迹^[31]，充分证明了汉军在此屯田的事实。汉武帝时期，耨的发明也极大地提高了耕种效率，《齐民要术·耕田篇》引崔寔《政论》：“武帝以赵过为搜粟都尉，教民耕殖。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种挽耨，皆取备焉，日种一顷，至今三辅犹赖其利。”^⑥汉朝曾在全国推广耨耕技术，因此耨耕也进一步推动了西域农耕发展。在屯垦戍边的广泛推动下，两汉时期的塔里木盆地绿洲形成了以农为主、以牧为辅、农牧互嵌、多元兼营的区域经济特色，成为新疆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时期^[32]。

第三，西域屯戍空间的有序运行带动了东西族群往来和文化交流。在西域屯戍保障下，西域诸国与汉朝来往密切，交流频繁。悬泉汉简中记载了大量关于使者往来的史实，如“黄龙元年六月壬申使主客给事中侍谒者臣荣制 诏侍御史曰使送康居诸国客卫候盖与副□为驾二封轺传二人共载”^{[23]222}，“建平五年十一月庚申遣卒史赵平送自来大宛使者乌陵奉献诣在所以”^{[23]198}，“送精绝王诸国客凡四百七十人□□廩使者食项适□”^{[8]17}。可见，来自姑墨、康居、大宛、精绝等国的使者往来于丝绸之路，与汉朝保持着密切关系，推动中原与西域的融合和发展。此外，楼兰王曾一次性率领多达260人的使

团前往中原，悬泉汉简载“楼兰王以下二百六十人当东传车马皆当柱敦”^{[8]27}，其沿途安全、交通、住宿等皆在汉朝的保障之下。“不属都护”的乌弋山离国也与汉朝有着密切的使者往来，悬泉汉简载：“遮要第一传车为乌弋山离使者。”^{[8]35}中原与西域使者的频繁互动，至东汉时期出现了“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3]2931}的盛况。

同时，丝绸之路东西畅通，东西方商贸往来也进入了黄金时期。史载汉武帝“闻天马、蒲陶则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圃。殊方异物，四面而至”^{[1]3928}，正是通过屯戍实现的。再如班超经营西域时，“班固与弟超书曰窦侍中前寄人钱八十万市得杂罽十余张”^[33]，“杂罽”为丝绸之路上贸易的毛织品，织造精美，是中原人竞相购买的珍贵商品，可见异域物产已经在中原得到认可并极大地丰富了中原社会生活。

殊方异域文化也对中原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来自中亚及北方草原等地的民族物质文化传入中原，《后汉书》记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3]3272}；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汉明帝时期，来自南亚次大陆的佛教经西域东传至中原，史载：“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3]2922}自此两千余年，佛教在中原大地广泛传播，深刻影响了中原文化和社会生活，促进了民族融合。

汉朝治理西域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不仅对统一多民族国家边疆治理历程影响深远，也进一步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一体”格局的基础。汉代通过屯垦戍边拓展了中原王朝在西域的战略空间，同时通过移民实边推动大规模中原移民进入西域，并保障了丝绸之路安全畅通，也打开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窗口。汉代西域屯戍空间成为丰富多元、开放包容的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地之一，源源不断地为中华民族输入新鲜血液，促使中华文明不断焕发新活力。

注释

①相关研究著作如：刘光华：《汉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刘继光：《中国历代屯垦经济研究》，团结出版社1991年版；等等。研究论文如：林剑鸣《西汉戍己校尉考》，《历史研究》1990

年第2期;余太山:《西汉西域屯戍校尉考》,《史林》1994年第1期;张德芳:《从悬泉汉简看两汉西域屯田及其意义》,《敦煌研究》2001年第3期;等等。②参见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503《邦计部·屯田》,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026页。③参见罗帅:《汉佉二体钱新论》,《考古学报》2021年第4期,第507—508页。④参见林梅村:《龟兹五铢钱考——兼论公元前5世纪至7世纪丝绸之路流通货币》,《故宫博物院院刊》2022年第2期,第44页。⑤参见杨銜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79页。⑥参见贾思勰:《齐民要术》,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8年版,第4页。

参考文献

-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
 [3]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4]王利器.盐铁论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5:556.
 [5]黄烈.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383.
 [6]陈桥驿.水经注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2013.
 [7]徐松.西域水道记:外二种[M].北京:中华书局,2005:102.
 [8]甘肃简牍博物馆,等.悬泉汉简:4[M].上海:中西书局,2024.
 [9]李炳泉.西汉中垒校尉“外掌西域”新证[J].西域研究,2004(3):69-71.
 [10]甘肃简牍博物馆,等.悬泉汉简:2[M].上海:中西书局,2020.
 [11]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焯.秦汉魏晋出土文献:居延汉简释文合校[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498.
 [12]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
 [13]陈直.居延汉简研究[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296.
 [14]王炳华.西域考古文存[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
 [1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普查办公室,巴音格楞蒙古自治州文物普查队.巴音格楞蒙古自治州文物普查资料[J].新疆文物,1993(1):1-94.
 [16]张安福,胡志磊.汉唐环塔里木烽燧布局的演变[J].史林,2014

- (2):25-33.
 [17]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不可移动的文物:阿克苏地区卷[M].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15:150.
 [18]张安福.西域屯垦经济与新疆发展研究[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13-21.
 [19]王隼.略说尼雅发现的“苍颉篇”汉简[J].西域研究,1998(4):55-58.
 [20]马雍.西域史地文物丛考[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42.
 [21]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1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2:92.
 [22]王子今.匈奴经营西域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241.
 [23]甘肃简牍博物馆,等.悬泉汉简:3[M].上海:中西书局,2023.
 [24]赵倬生.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109.
 [25]郑晓云.汉代中原水利的西传与民族融合[J].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3(6):21-32.
 [26]孟凡人.楼兰新史[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141.
 [27]陈汝国.楼兰古城历史地理若干问题的探讨[J].新疆大学学报,1984(3):50-61.
 [28]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M].北京:中华书局,2020:14-16.
 [29]王国维.观堂集林[M].北京:中华书局,1959:621.
 [30]王炳华.丝绸之路考古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237.
 [31]张弛.两汉西域屯田的相关问题:以新疆出土汉代铁犁铧为中心[J].贵州社会科学,2016(11):70-75.
 [32]吕卓民,陈跃.两汉南疆农牧业地理[J].西域研究,2010(2):53-62.
 [33]李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3631.

The Construction of Garrison Space and Ethnic Integration in the Western Regions during the Han Dynasty

Dang Lin

Abstract: Since the Han Dynasty managed the Western Regions, the strategy of settling and guarding the border has been a long-standing one, continuously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governance measures and the process of ethnic integration in the Western Regions of the Central Plains dynasties. During the Han Dynasty, the Central Plains regime established garrisons in areas such as Quli and Luntai at the southern foot of the Tianshan Mountains, gradually forming a garrison pattern that extended westward to Kucha and Shule, eastward to Yiwu, southward to Loulan, Yutian, and Shache, and northward to Wusun, laying the spatial foundation for the Central Plains' governance of the Western Regions. At the same time, the Han Dynasty established the Western Regions Protectorate as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center of the Western Regions to manage the garrison, further improving the garrison governance system. Through measures such as building post roads and constructing beacon systems, it provided key military defense support for the spatial management of the Western Regions garrison. In addition, the Han Dynasty's settlement and border defense promoted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to migrate to the Western Regions, gradually forming a production and living area centered on the governance of the Central Plains, leading to the formation of spatial and cultural identity among multiple ethnic groups in the Western Regions towards the Central Plains dynasty, accelerating the process of ethnic integration, and injecting inexhaustible power into the common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the Western Regions of the Han Dynasty; Garrison Space; Ethnic Integration

责任编辑:长 亭